

以劣胜优 伏击制敌

——红6军团沙市战斗

■张磊毕艳

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红6军团在中共湘赣省委的领导下，积极展开斗争，打击进犯之敌，保卫湘赣苏区。3月，国民党西路军第1纵队司令刘建绪命令驻莲花的第63师、驻安福的第62师第186旅等部开始筑碉推进，以压缩湘赣苏区的生存空间，加强对苏区的封锁，同时还将第15师全部集中于江西永新城，准备随时发起进攻，歼灭红6军团于禾水以北、袁水以南地区。

为应对日益逼近的敌军，中共湘赣省委于3月底召开扩大会议，对当时湘赣苏区面临的形势及红6军团的作战方针进行研究。会议认为，红6军团虽经连续行军作战减员较大，但骨干力量基本保存，全体官兵战斗意志高昂；而国民党军第15师骄横轻敌，且永新至莲花、永新至安福的交通线尚未打通，敌军在长距离机动中易暴露弱点。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既无休整条件，也不宜硬攻敌军重兵防守、工事坚固的永新城，应充分发挥自身机动灵活的优势，利用敌军弱点，积极寻找有利战机，在运动中歼灭敌军。这一决策随即成为红6军团打击敌第15师的作战方针，一场精心谋划的战斗即将打响。



位于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的沙市大战胜利纪念碑。资料照片

亭阻击阵地，红军学校在江背北侧展开，以火力将敌第43旅与后续部队割裂开来，既截断了第43旅的退路，也切断了该旅与后续部队的联系。红军第49团、第52团听到第51团与敌打响，立即向敌人发起猛攻。

一时间，10余里的山冈上枪声、喊杀声震天，敌军措手不及，队伍大乱，狼狽逃窜。敌第43旅旅长见行军纵队全线遭红军突击，急忙率旅直属部队及后卫第86团占领大路北侧的王坳、练屋里一带高地负隅顽抗，等待后续部队增援。第51团击破敌先头团后，军团投入预备队，与第51团协同沿大路北侧高地向东攻击；第49团主力及第52团集中突击扼守王坳、练屋里高地之敌。红军士气高昂、越战越勇，而国民党军仓促占领阵地，来不及构筑工事，指挥失灵，仅三四十分钟，王坳、练屋里高地之敌就被歼灭。至13时许，敌第43旅被彻底歼灭，少数逃至禾水以南的敌人，也被红军学校和地方武装消灭。敌旅长率残部仓皇向东逃窜，红军乘胜追击，将其包围在汤溪至沙市的河谷中。

在红军猛攻敌第43旅的同时，敌第16师47旅和第15师后续部队，向红53团发起疯狂进攻。第53团全体指战员为保障主力顺利开敌，团结一致，坚守阵地，顽强阻击。敌人受地形限制难以展开，发起的5次冲击均被打退。第53团胜利完成阻援任务。随后，红6军团鉴于澧田尚有3个旅敌人，迅速将主力转移到沙市、澧田间以北七八里的山地，在此击溃了向红军进攻的2个旅敌军，残敌退至澧田固守，红军停止进攻，战斗宣告结束。

沙市伏击战速战速决、干净利落，整个战斗仅用两个小时，就全歼国民党军第15师第43旅，俘敌1000余人，毙敌600余人，缴获步枪2000余支及大量其他武器和物资。此战是红6军团在与敌力量对比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贯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原则、以劣胜优的成功战例。当时，红6军团在兵力数量和武器装备上均处于劣势，能一举歼灭敌人一个旅，实属不易。这一仗沉重打击了深入湘赣苏区的敌军，挫败了敌人企图将红6军团消灭于禾水与袁水之间的狂妄计划，暂时缓解了湘赣苏区的紧张局势，振奋了红军和群众的斗志，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史说新语



△赵宝印和曹新仁击落敌机时使用的步枪。

资料照片

△王文礼用步枪击落敌机后获得的奖章。

资料照片



战机压得很低。当敌机进入有效射程后，赵宝印率先向飞得最低的敌机射击，连续打出7发子弹。随后，曹新仁也打出6发子弹。二人的一通射击，恰好打中一架美军P-51“野马”战斗机。敌机当场失控，坠毁在2里外的山沟中。

1951年7月，志愿军总部为表彰赵宝印、曹新仁的英勇事迹，授予两人“特等功臣”称号。那支立下奇功的“三零步枪”，现陈列于辽宁丹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馆，成为这段以弱胜强传奇的历史见证。

王文礼、宋岭春、赵宝印和曹新仁，都是人民军队中的普通战士。尽管他们的战斗岁月跨越不同年代，但在敌机来袭时，他们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哪怕只有一支步枪在手，也要战斗到底、夺取胜利。他们的英雄事迹，见证了人民军队敢于斗争、以弱胜强的光荣传统，必将在强军征程中代代相传、永放光芒。

链接历史

实地勘察地形，形成伏击方案

根据当时情况判断，敌军可能首先打通由永新到莲花的交通，再向黄岗、花溪地区进攻。红6军团领导随即率部分干部赴永新通往莲花的大道实地勘察，选定战场。

经勘察，沙市是永新通往莲花的必经之地，位于永新县城以西45里。永新至沙市的大路南侧紧邻禾水，形成天然阻隔；北侧永新至澧田段为险峻大山，澧田至沙市段靠近道路的区域是树木茂密的丘陵，极利于部队隐蔽。这种一侧临水、一侧靠山且道路狭窄的地形，迫使敌军从永新城出动后只能沿大路成一路纵队行进，队伍必然拉得很长，难以迅速展开，便于红军集中兵力打击其前梯队，实现速战速决，而敌后续部队受地形限制无法及时增援。尤其是澧田至沙市的地段，地形两头窄中间宽，形如口袋，是伏击的理想阵地。据此，红6军团制订了在沙市地区以伏击手段截击敌人的作战方案，并上报中革军委。

3月30日，中革军委复电同意在沙市地区部署歼敌，并指出：“我17、18两师主力应先在有适当地区隐蔽，待敌后梯队到，即一齐猛攻，解决敌人，先头部队如已发觉我军，（突击队）不应待敌展开，即行猛烈短促侧击其前梯队，使其

后梯队赶不及。”

周密运筹兵力，巧设“口袋”阵法

4月4日，红军通过永新城内的秘密渠道获悉，国民党军第15师正在城内赶制干粮、强抓民夫，计划于5日向沙市进犯。红6军团立即集结部队，连夜从黄岗、花溪出发，开赴沙市至澧田大路以北三四里处，潜伏于丛林杂草之中，静待伏击战机。

4月5日拂晓前，各部队均按时抵达指定位置：红17师第51团部署在沙市东北，第49团位于乌宗南面；红18师第52团在汉山附近展开。这3个团集中在沙市至涂下垌4里多宽的正面阵地上，担任突击任务，重点打击敌先头部队；红18师第53团扼守谭家村后山与悦义亭之间的阵地，红军学校在禾水南岸的江背、南城地区布防；第49团1营作为军团预备队，在乌宗附近待命，准备执行侧翼迂回任务。军团指挥部的作战计划是：集中主力伏击敌前卫旅，待其进至沙市、澧田之间时，以3个团并肩出击，从侧翼突击敌行军纵队；以第53团和红军学校在澧田西侧禾水两岸占领有利阵地，阻敌增援并切断其退路。

与此同时，侦察部队与作述区（原澧田、沙市区）、象形区游击队协同配合，在澧田至沙市沿途设置了6个递步

以平凡武器创造非凡功勋

——我军历史上用步枪击落敌机的战例

■郭阳东

当凌空肆虐的敌机，对只有栓动步枪的步兵进行扫射时，胜负的天平似乎已早早倾斜。然而，在人民军队的辉煌战史上，却不止一次上演过用步枪击落敌机、实现绝地反击的英雄壮举。

1932年初，红5军团战士王文礼进入江西湘东工农红军学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在校期间，他钻研每一门功课，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和严格的军事实践，政治觉悟与军事技能得到显著提升。

7月下旬的一天，王文礼与同期学员在野外进行战术演习时，3架国民党军飞机突然由远及近俯冲而来，对训练场进行扫射与投弹。训练场瞬间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几名学员不幸牺牲。看着战友的遗体 and 远去的敌机，学员们义愤填膺。不久，敌机折返回来，更加肆无忌惮地低空扫射。王文礼抓起一支步枪，瞄准迎面而来的第一架敌机射击，因飞机高速掠过未能命中。紧接着，另一架敌机俯冲而来，王文礼冒着弹雨沉着瞄准，果断击发，子弹精准击中敌机油箱。敌机瞬间浓烟滚滚，一头栽向地面爆炸起火，其余两架敌机见状仓皇逃窜。训练场上的学员们冲向坠机点，高声欢呼胜利。王文礼由此成为我军历史上第一个用步枪击落国民党军飞机的战斗英雄。他用步枪创造奇迹的消息迅速传遍中央革命根据地，极大鼓舞军民的抗战信心。

为表彰王文礼的出色战绩，工农红军学校授予他“英雄对空射击手”称号，时任校长兼政委刘伯承亲自主持表彰大会，号召全体学员向他学习，并亲手将一枚特制银质奖章佩戴在他胸前。这枚五

角星奖章正面刻有飞机与步枪图案，五个角分别刻字，连缀为“红军学校奖”，背面则镌刻“对空射击手”5个字。1979年，王文礼之子遵照父亲遗愿，将这枚珍贵奖章连同工农红军学校第三期毕业证书一并捐赠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步枪击落敌机的传奇战例，在抗日战场上再次上演。创造这一奇迹的，是八路军胶东军区的年轻神枪手宋岭春。他从小跟着父亲上山打猎，展现出极高的射击天赋，只要是他看中的猎物，基本都逃不过他的枪口。1942年3月，17岁的宋岭春参加八路军，凭借精湛枪法，1年之内就用步枪狙杀了多名日军，成为所在部队小有名气的神枪手。1943年2月，宋岭春进入山东“抗大”分校学习军事技术。半年时间里，他刻苦钻研射击，练就了过硬本领；毕业后，他使用的是从日军手中缴获的“三八大盖”步枪。

1943年9月的一天早晨，宋岭春与战友们正准备吃饭，突然对空警戒哨兵发出紧急防空信号。大家迅速放下饭碗，拿起武器，快速分散隐蔽到村边山坡的灌木丛和沟壑中。宋岭春注意到，4架日军战机飞临村庄上空，一接近就开始俯冲轰炸和扫射。日军飞行员仗着八路军没有防空武器，故意低空飞行，甚至降到离地面仅100余米的高度。隐蔽在灌木丛中的宋岭春，清楚地看到飞机翅膀上刺眼的太阳旗，一股怒火涌上心头，他开始盘算如何用步枪把敌机打下来。

当一架敌机转弯时，驾驶舱暴露在宋岭春的视野中。他死死盯住这架敌机，眼看它越飞越低、越飞越近，猛地举起步枪，

根据飞机速度计算好提前量，果断瞄准飞行员头部击发。子弹精准命中目标，日军飞行员当场毙命，战机瞬间失控，一头扎向山崖爆炸起火。其余3架日军战机见状，吓得迅速拉升高度，仓皇而逃。

时任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得知消息后，专门接见宋岭春，称赞他“打得好，创造了我军前所未有的战绩”，并为他记大功一次。用步枪击落敌机的传奇经历，成为激励宋岭春奋勇前行的强大动力。在战争年代，宋岭春先后荣获“战斗大功奖”2次、“战斗模范奖”1次，从一名普通战士逐步成长为营级干部。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军用步枪击落敌机的战例，出自两位志愿军汽车兵之手。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志愿军战士赵宝印随部入朝参战，主要任务是向前线运送战略物资、抢运伤员。尽管汽车兵并非一线战斗人员，但由于运输线是美军重点打击目标，且当时志愿军缺乏伴随防空火力，美军战机对志愿军运输车队的轰炸极为猖獗，汽车兵伤亡较大。一次，赵宝印所在的汽车团某班执行运输任务时遭遇美军飞机轰炸，全班13人牺牲11人，仅2人重伤幸存。

1951年3月20日清晨，赵宝印、曹新仁与战友老杜3人执行弹药运输任务。当汽车行驶至朝鲜新溪郡石边里村附近时，4架美军战机突然来袭。当时四周地形空旷，无险可守，赵宝印先将年龄较大的战友老杜隐蔽在一块石头后，自己和曹新仁藏在汽车侧面，操起“三零步枪”瞄准越飞越近的敌机。骄横的美军飞行员认为志愿军不敢反击，故意将

在战火淬炼中学会打胜仗

■周一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是党中央为适应抗日斗争形势、培养抗战干部而创办的军事院校。从1936年创建到1945年完成历史使命，“抗大”在9年多的战火淬炼中，探索出独具特色的打仗育人经，为人民军队和地方党政机关输送了大量人才，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作为这所大学重要的教学资料，“抗大”的军事教材体系完备、不断创新，并在战火硝烟中持续接受实践检验，成为培养优秀军事指挥人才的重要保证。

多措并举建立教材体系。“抗大”创建之初，办学条件十分简陋，缺教员、缺校舍、缺经费，更缺少适应抗战形势的军事教材。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一直高度关注“抗大”军事教材的选择、编写与使用，毛泽东同志曾致电在苏联的王稼祥：“大学缺战略教本，请搜集战略书，并找人翻印，先后寄回。”曾经主抓“抗大”军事教学的郭化若曾说，“部队的军事教育关键是教材问题，即引导指战员学什么、练什么”。因此，新编军事教材成为“抗大”开展军事教育的重要任务。

关于教材种类，刘伯承在《合同战术》译版序言中划分为3种，一是“毛泽东同志所著《论持久战》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我军战史，尤其是最近实战战例”；二是“日本作战要务令，尤其它最近对我作战的教令”；三是“《合同战术》和《野战条令》”等外军主要教材。这样的分类方法被“抗大”采纳，其中，以第一种为基本教材，第二、三种教材为延伸学习内容，共同构成“抗大”军事教材体系。

“抗大”筹备期间，军事教材编印工作主要由郭化若和王智涛负责。他们仅用一个星期就编写并油印出部分基本教材，保障学校如期开学。开学后，王智涛等具有留学经历的军事教员，在学校统一部署下加快对外军教材的翻译与编印，重点聚焦苏联红军教材、条令条例等。此外，他们结合“抗大”实际编写了“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勤务条令”等，帮助学员尽快筑牢战术基础、养成良好作风纪律习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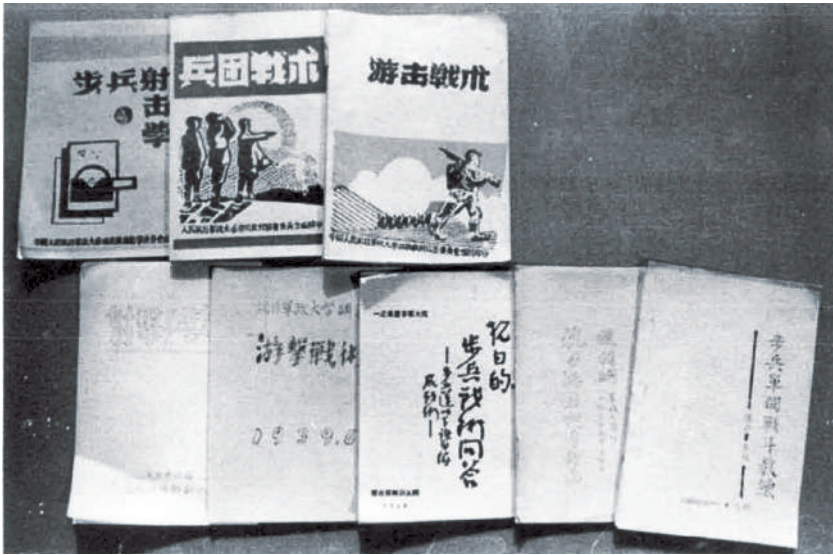
精益求精抓住教学核心。“抗大”的《组织条令》明确其教育原则为：“少而精，理论与实际并重，理论与实际联系，体力、智力相统一，军事、政治之适当配合，进行革命批判的教授制度。”“抗大”之所以坚持“少而精”的军事教育理念，与自身主观条件密切相关。

一方面，抗战形势日趋紧张，急需大量补充抗战干部，这使得“抗大”采取短学制模式，学员在校时间通常仅半年左右，不具备系统接受大量军事教育的时间条件。另一方面，学员文化基础参差不齐，部分学员缺乏系统的文化学习经历，读写能力相对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教育必须更注重实用性，去繁就简、取其精华，让学员学到最管用、最急需、最核心的内容。

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抗大”及其分校主动删减大量与敌后游击作战关联不大的教学内容，对大部分学员减少了《战争论》《资本论》等军事、哲学基础理论课程。尤其是在敌后办学期间，针对即将开展游击作战的核心任务，各分校的军事课目设计更贴合实际。在步兵战术与游击战术方面，重点教授埋伏、袭击、破击等基本战术，以及刺杀、射击、投弹、土工作业等战斗技能。在外军知识方面，重点研究日伪军战术，兼顾国民党军作战特点。在条令教范方面，重点学习《苏联工农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开展制式教练和常用武器知识培训。

结合实际不断创新发展。在坚持“少而精”的前提下，“抗大”根据战场形势变化，在有限时间内调整军事教育比重，使培养的抗战干部更贴合战场需求，教学效果显著提升。

大学建立之初，毛泽东同志曾指示“文化教育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学校据此制订军事、政治、文化各占三分之一的教育计划，旨在帮助高级干部尽快提高文化水平，深化对军事理论的规律性认识。到“抗大”第2期和第3期，学校先在三者并重的基础上，增加抗日游击战争战术教程，着重强化学员的战



“抗大”的部分军事教材。资料照片